

完善選舉與司法制度是民心所向



攪炒派近年在議會中的瘋狂行徑，煽動黑暴，勾結外力，一切源於香港沒有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及「愛國者治港」要義，令攪炒派利用現時選舉制度漏洞，竊取公職人員的權力，大肆搞亂香港。特區政府必

須盡早將「愛國者治港」制度化、法律化，確保所有公職人員必須是「愛國者」。筆者認為首要堵塞選舉制度漏洞，期望中央與特區政府盡快為香港選舉制度撥亂反正，以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令香港返回正道。

容海恩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 大律師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就「愛國者治港」原則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提出三個「愛國者」標準、四點「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士」要求以及五項落實「愛國者治港」須堅持的原則，為「愛國者治港」定標準、立規矩、劃底線，為香港正本清源。

「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要義。筆者過去多次指出，要成為「治港者」必須是「愛國者」，「愛國者治港」是對公職人員的最基本要求，而且放諸四海皆準。可惜，香港回歸祖國24年來，在落實「愛國者治港」方面的工作不足，結果引發連串黑暴「攪炒」亂象。攪炒派利用反修例黑暴至風進佔區議會，結果令區議會成宣揚「港獨」的平台，更令區議會嚴重失效；之後組織、策劃及參與所謂「35+初選」

及「攪炒十步曲」，企圖於取得立法會主導權後，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及政府法案，迫令特首下台，甚至以大規模暴動等手段，及乞求西方制裁，令香港癱瘓，要「攪炒」香港和國家，圖謀極之歹毒。幸而中央及時出手，推出香港國安法，才令香港由亂轉治。

「愛國者治港」要制度化

不過，攪炒派至今仍死心不息，繼續利用法律及制度漏洞搞亂香港。因此，特區政府必須盡快將「愛國者治港」法律化及制度化，將「愛國者治港」的要義體現於不同的制度上，確保所有公職人員均為「愛國者」。這些制度包括所有產生公職人員的制度，例如招聘、協商、委任以及選舉等制度；特區的行政、立

法、司法機構的組成人員以及重要法定機構的負責人，都要符合「愛國者」的標準。

正如夏寶龍主任指出，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需要多措並舉、綜合施策，其中最關鍵、最急迫的是要完善相關制度，特別是要抓緊完善有關選舉制度，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

中央有權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筆者非常認同夏寶龍主任所講，目前最關鍵、最急迫的，就是要完善選舉制度，包括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筆者作為大律師，也非常關注完善司法制度的問題，例如司法人員任命、宣誓及申訴等制度，以至大律師公會等專業團體是否應由愛國者主導，業界及公眾要求

改革的呼聲日增，特區政府必須盡快處理。

政治體制問題是中央的事權，中央有絕對權力與責任修改香港選舉制度，特區政府應盡快向中央提出呈請，在中央主導下展開完善選舉制度的工作，例如訂定各類選舉包括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立法會、區議會的候選人、當選人及獲委任人員的資格與規定，以及修改和更新選舉制度，完善整個選舉方法及安排，以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防止攪炒派再借各種選舉搞亂香港。

香港是多元社會，中央對香港社會有不同取態與聲音是理解和包容的，但「反中亂港者」出沒，愛國愛港者治港，絕對天經地義，只有全面準確理解和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及「愛國者治港」原則，香港才能長治久安，「一國兩制」才能走得更穩、更遠。

維港波覽

拜登的「香港牌」會如何打？

陳少波 正思香港總裁

相比2020年，2021年香港外部環境的最大變化當屬美國政府換屆，即「拜（登）上特（朗普）下」。去年11月選舉結果甫一落定，近年來與特朗普陣營頻繁互動的反對陣營頓時如喪考妣，似認定贏得選舉的拜登勢必對華放軟手腳。在香港社會，似也有部分聲音認為，特朗普下台後香港所面對的美國壓力將會隨之舒緩。歸根究底，核心問題在於，拜登四年美國將會如何打「香港牌」？其切入點、力度與打擊工具，將會如何影響香港治理？

分析這個問題，需從兩個維度分別入手。一則分析拜登政府外交、國安團隊近期涉港言論，再根據其談話的時空環境加以甄別，進而大致勾勒出其可能的行動選項；一則分析美國對華、對港策略之演變脈絡，抓住主線，由此研判新政府可能的對港路線。一則重證據，一則重邏輯；一則審視細節，一則縱觀大勢，而最終之綜合研判，兩者皆不可荒廢且須相互印證。

美對港政策服從於其對華戰略

拜登外交、國安團隊的陣容已然清晰——國安會由蘇利文、坎貝爾、羅森伯格主責對華戰略，國務院則交由布林肯掌執。該團隊過去一年的公開發言中較受重視者大致如下：去年5月間布林肯對香港國安法的表態，去年12月、今年1月蘇利文、布林肯分別在推特上聲援被捕的反對陣營頭目，布林肯在參議院外委會聽證會上的發言以及蘇利文與前任國安會顧問對話時的表態。這些表態大多強硬，以示他們對反對陣營的支持！不過，我們研判時還需考慮到這些硬話的特殊政治時空：大選競逐、參議院審議提名等因素的影響，因此不可簡單地將之等同於拜登政府未來的對港政策。

拜登外交、國安團隊之所以對港嘴硬，當然受制於美國對華的整體氣氛，受制於中美關係變化的大局。美國的對港政策向來服從於其對華整體戰略，要評估對港政策必須要判斷美國對華戰略的變化。

其實，中美關係變冷並非始自特朗普

時期，而是早從2010年奧巴馬政府推行「亞洲再平衡」戰略（正是由坎貝爾操盤的）業已開始，只不過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公布其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時把話說得更露骨而已。此後，基辛格不僅判定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去了，更在2019年11月形容中美「已走到冷戰的山腳邊」。簡言之，美國在過去十年已逐步放棄自基辛格50年前秘密訪華所開啓的對華「接觸」戰略（其實一直是「接觸」+「阻遏」）。

港「示範」內地戰略價值大幅縮水

以1992年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為標誌，美國明確了在後冷戰年代的對港政策，其核心無外乎是對中國內地的兩大「示範」——自由市場經濟與民主選舉政治，即「華盛頓共識」的核心內容。這種「示範」無疑服從於對華「接觸」戰略，旨在透過香港的「示範」來推動內地經濟、政治制度的轉型。在「接觸」戰略已被美國官學界普遍認定失敗的當下，香港「示範」內地的戰略價值也隨之大幅縮水。

2019年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的通過業已標誌著美國對港政策的結構性轉變。既然已經無法通過各種手段來掌握香港的管治權，無法扶植一個親美的政權，那麼出重手砸爛這個「示範單位」，美方也就沒有太多的顧慮。過去兩年間這一點業已相當清晰。在香港問題上對華擺出強硬姿態已成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共識，並不會因為「拜上特下」而有大幅改變。拜登政府的對港政策大致不脫於《香港人權與民主法》、《香港自治法》所確定的整體框架。因此，特朗普時期推行的多輪制裁措施，拜登團隊不會輕易撤銷，而去年在參議院折戟的《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很可能改頭換面重新來過，推出吸納反對陣營暴徒入境美國的所謂「避風港」簽證。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團隊多為外交老手，在操作手法和風格上與特朗普團隊大相逕庭：民主黨更重依靠多邊框架行事，也更重視在輿論場特別是網絡輿論場掀起「價值觀戰爭」，擅長把硬拳

藏在金絲絨手套裏。

嘴硬雖然很硬，但身體卻很誠實。想做的並非一定能做到，拜登自有拜登的難處，有他無法逾越的政經局限。美國內部問題重重，種族撕裂加劇，疫情壓力未減，近日得州暴風雪來襲再添新愁，更重要的是包括特朗普陣營在內的多股極右勢力始終虎視眈眈，中期選舉的擂鼓聲很可能會提前響起。拜登的主要精力恐怕要更多地應付其國內政爭，至少短期內不得不如此。

拜登對港政策或「嘴硬而手軟」

我們既不要對拜登四年美國對港政策緩和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該來的還是會來，甚至暴風雨可能比特朗普時代還要猛烈一些。但是，同時也不要高估了美國對港打壓措施的威力。特朗普政府實施了多項制裁措施，卻根本無法撼動香港政局基本盤，而拜登政府目前手中可打的牌已經不多了，且每張牌都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平衡不易，美方出手力度越大，反噬自身的力道也就越大。因此，嘴硬而手軟恐怕是拜登政府的選擇，反對陣營只能哀嘆不已了。

需要注意的是，當我們談論美國對港政策，要清楚我們所談論的到底是哪個美國。國會山的取態與白宮並不完全一致，當拜登放軟手腳的時候不排除個別激進的參議員會玩出新的幺蛾子，以國家民主基金會（NEF）為代表的美國政治NGOs也可能採取新一輪的攻勢。美國資本力量與政黨的利益也不完全重合，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更有着不同的利益訴求。這些都可能影響美國對港的行動選項。而中央在主導香港治理方面的作為，也可能形成一種特殊的動態平衡，引起美國政壇的連鎖反應，從而迫使拜登政府採取反擊措施。

無論如何，置身於百年未有之變局，中國早已不是以前的中國，香港更不是修例風波前的香港，而香港治理成敗的關鍵所在，是我們如何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如何深耕社會，建立廣泛而牢固的「愛國者治港」聯盟。

（居安思危論香江三之一）

穆家駿 中學教師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名家時評

最近有不少評論指，前食環署署長在前年「黑暴」期間，對反中亂港的黑暴文宣「連儂牆」視若無睹，拖延至當年區議會選舉結束後才清理，變相成為不少「黃絲」區



議會候選人的免費宣傳板。此人如此的「表現」，近日卻能繼續升職擔任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食物），難免讓筆者慨嘆究竟夏寶龍主任所說的「愛國者治港」，到了特區政府實施中會否變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口號？

綜觀全球，在190多個有成文憲法的國家中，絕大多數國家都要求公職人員宣誓保護自己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尊重及遵守憲法。因此以「愛國者」為主體的管治團隊本來就是「國際標準」。而且在夏主任的講話中提到，在公職人員中擔當重要領導職位的，更加要求應該是「堅定的愛國者」，是一些能夠在風浪中敢於擔當，並考慮香港以及國家利益的賢德之人。特區政府中有誰算得上「堅定的愛國者」，相信讀者自有定論。

除了政府行政部門的公職人員外，透過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也必須是「愛國者」。在選舉制度中怎樣能保證產生「愛國者」呢？這一步就必須從完善選舉制度開始。縱使中央對於香港回歸的處理是「一國兩制」，但是中國始終是一個單一制的國家。在單一制的國家，任何地方的選舉制度都是由中央決定的；作為一項國際慣常的政治倫理，在完善選舉制度中加入「愛國者治港」也不是什麼「高標準」，不過是對治理者的底線要求。

香港回歸已經23年了，以往中央對港的「不干預」，換來的並不是繁榮穩定，某些反中亂港分子公然勾結外國勢力鼓吹本土分離主義。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針對的是站在愛國者對立面上的那些少數反中亂港分子，不允許他們染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試問，一個連自己國家都不愛的人，如何能擔當起管治的重任？任由反中亂港分子為所欲為，香港又談何未來？

許楨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現居政府的理財哲學，敵人一直有所保留。回首2017年中，一方面，政府有萬億計港元盈餘；如何善用之，以符合基本法「量入為出」原則，值得社會上下共同思量、作長久計。另一方面，本地產業結構單一，造成稅基不穩。外圍經濟波動，會大幅影響政府歲入。再加上本地社會步入老齡化深水區，勞動力、消費力、增長潛力從量到質的萎縮，又增加了結構轉型、產業升級的難度和成本。

慮及上述三點，港府應該極其慎重控制「恒常開支」——無論是教育、醫療、扶貧還是安老，都應該更具前瞻性。在提升社福服務水平之餘，要高度結合產業化之思維。否則，單靠稅賦之投入，實在難以持久。然則，以2017年中為界，港府「恒常開支」不只有3,000餘億之譜，暴漲至逾5,000億。而且相關投入，並未與相關領域之產業化相結合，而單純屬於開銷提升；在好年時間銷猛增，如今遇上災疫，自然沒有多少迴旋空間了。

以此為背景，本年度看似嚇人的近3,000億赤字背後，稅賦收入只下跌了半成，抗疫、振興措施所費亦僅逾2,000億——「恒常開支」佔了總數的三分二強。簡言之，即使未有災疫降臨，因「恒常開支」近年急升，今年赤字亦不會好看到哪裏去。其中，起主導作用者，乃現居政府的總體施政方針；財政司只能在此框架下，安排有限資源應對時弊。從理性角度講，民衆對財政司的不滿，應該集中在預算案執行的技術層面；在嚇人的「恒常開支」以外，再拿出三五千億去抗疫、振興，實在不切實際。

即便如此，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也因為一連串技術層面錯誤，而累積各界劣評。其一、是稅務調整過於粗疏。無論各專業人士，還是財金界別，都大感錯愕。在全球化語境下，各國企業、人才對各式稅項成本愈發敏感。作為以服務業、本地消費為主，高度外向的小型經濟體，香港過去一年大受疫情打擊，但疫後恢復能力並不弱。在眼前動股票印花稅、汽車稅費的腦筋，退一步講，都屬失諸交臂。其實並不必為一時不景氣，而動搖市場信心。

其次，在派發消費券和失業援助方面，卻失諸交臂不能救近火；政府資源投入了、展現出政治承擔，卻未能急民衆之所急。財政司司長強調「限米煮飯」是切題的，但救人如救火，行動應快似閃電。在2021年首兩季就能發放三數千元現金，或許比大半年後派發金額高逾倍的消費券更強。

「愛國者治港」激發社會正能量

何超蓮 香港義工聯盟常務副主席

對於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北京舉行的完善「一國兩制」專題研討會發表有關「愛國者治港」的重要言論，一針見血，無庸置疑。「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基本核心要求，不是中國獨創先河，世界各地的政府也有相關憲法去保障國家安全。因此「愛國者治港」完全順理成章、天經地義。

香港的管治權必須掌握在愛國者手中，也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完全符合香港人的利益。在香港行政權架構中，身處重要崗位、

掌握重要權力、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士，更應提升更高的愛國標準。面對涉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等重大原則問題上，香港行政掌權者更應勇敢站出來、旗幟鮮明、堅決鬥爭。香港命運與祖國緊密相連、休戚與共。只有精誠團結愛國者力量，激發社會正能量，才可以更牢固中華民族的愛國情懷，攜手共創光輝明天。

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既保證選舉公正、公平、公開，又切實有效地阻止反中亂港分子、國際反華勢力的政治

代理人進入香港政權機關，為禍香港。

香港經歷黑暴及疫情重挫，經濟及民生飽受煎熬。反中亂港分子只會給香港帶來破壞、動盪、恐怖等災難，他們是香港繁榮穩定的破壞者，市民耻與為伍。只有愛國者才能真正為港人謀福祉，以國家的利益為先，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促進香港與祖國共同發展。不論實施香港國安法，還是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中央政府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是為實踐「港人治港」的決心，令「一國兩制」行穩致遠。